

近代
叙事诗
研究

李亚峰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近代
叙事诗
研究

李亚峰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叙事诗研究/李亚峰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5161-6661-1

I. ①近… II. ①李… III. ①叙事诗—诗歌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6695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无 介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75
插 页 2
字 数 303 千字
定 价 6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亚峰仁棣《近代叙事诗研究》书稿杀青，嘱我写几句话为弁言。

西方文论讨论诗歌之体裁，常以叙事和抒情为限。缘此，他们对叙事诗有严格的标准，主要是强调叙事情节的完整性。以此衡量中国的古典诗歌，其实鲜有合规者。我们不能说西方的叙事诗排斥抒情的功能，但是，比之抒情诗，这种功能是相对弱化的，至少是隐现的。在中国古代，最初讨论诗歌，并不言叙事，《毛诗序》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文赋》所谓“诗缘情而绮靡”，都是突出诗歌的抒情性。而与缘情分庭抗礼者，则为言志，和叙事也并无直接的关联。因此，中国诗歌即使叙事，也只是抒情的帮衬。我们找到较早涉言叙事的北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其中有云：

石延年长韵律诗善叙事，其他无大好处，《筹笔驿》、《铜雀台》、《留侯庙》诗为一集之冠。五言小诗如“海云含雨重，江树带蝉疏”、“平芜远更绿，斜日寒无辉”者，几矣。白居易亦善作长韵叙事，但格制不高，局于浅切，又不能更风操，虽百篇之意，只如一篇，故使人读而易厌也。

除了先前出现的乐府民歌外，唐代白居易可算是中国叙事诗作家的早期代表了。但是，魏泰对其作品评价不高，且没有列举具体诗篇。相对而言，对今天学界不太关注、读者也不太知晓的宋代诗人石延年的叙事诗却有较高评价。魏泰所举石延年相关作品，凡三首，今仅存吟咏诸葛亮出师伐魏的《筹笔驿》。除构思略承袭李商隐同题诗作外，通篇感叹多于叙述，按西方文论的标准，也是很难归入叙事诗行列的。

其实，当下讨论中国的古典诗歌，其与“事”联系在一起而成为诗学理论之概念者，常见的除“叙事”以外，尚有“用事”、“纪事”。所

谓“用事”，就是用典，即引用典籍中的故事。《颜氏家训》言“沉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沧浪诗话》言“押韵不必有出处，用事不必拘来历”。可知，“用事”只是诗歌创作的一种修辞手法，甚至是其他文体，诸如古文创作亦可使用的修辞手法。

“纪事”的广为人知，起于一种诗歌总集之编纂方式。这种方式始由南宋计有功撰《唐诗纪事》奠定。说是“撰”，因与一般的总集编纂不相类。其主要的工作是考稽诗人生平事迹，搜集诗歌散佚作品，发掘创作本事背景，以及荟萃有关诗人诗歌的评论。所以，所谓“纪事”，其实是记录诗人创作之事，而非诗歌叙述之事，甚至许多文字与创作之事亦无多大关系。以后厉鹗《宋诗纪事》，陈田《明诗纪事》，均沿用其法，不脱此窠臼。唯陈衍辑撰《元诗纪事》，谓所录“必本事考据所在，其泛泛评品，概所不登”，这多少可以让“纪事”名副其实。然强调的还是创作之事，其所收作品大多与叙事诗相去甚远。及仲联师率余辈编次《清诗纪事》，方始稍有改观。这种改观首先得益于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至清代，其叙事功能有了长足的进步。《清诗纪事·前言》在列举了清代大量的叙事诗经典作品后称：“可以说，叙事性是清诗的一大特色，也是所谓‘超元越明，上追唐宋’的关键所在。《清诗纪事》的作用，将会通过检阅清诗的独特成就来确立它在中国诗歌史上的恰当地位。”

当然，即使是清代，如果用叙事情节的完整性来要求，堪称叙事诗的作品还是凤毛麟角。《清诗纪事·前言》说《诗经》中叙事之诗“篇数不多，且大都篇制短小，不能同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或古印度的《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那样的长篇史诗相比并”，其实，在整个中国诗歌史上，包括清代，也没有可以相媲美的长篇史诗。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针对中国诗歌的特点，是否应该确定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诗标准，并对此做出相应的研究，毕竟，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

本来，中国诗歌的叙事，并不强调对某一事件或某一人物的记述，而重在关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和特征。《毛诗序》云：“至于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郑玄《诗谱序》进一步的阐释是：

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

受潞亭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

由此可见，《诗经》定下的中国诗歌功能的基调，便是《礼记·王制》所说的“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以后，孟棻《本事诗》谓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杜甫作诗，重点不在客观的叙述，而在主观的感受。这种感受源于社会动荡和山河兴废，以及动荡兴废中百姓的艰难苦恨。或许，这就是西方的史诗和中国的诗史之根本差异，也就是我前面所说的西方是叙事隐现抒情，而中国则是叙事帮衬抒情。

以诗史的标准构筑中国的叙事诗评价体系，特别适用于近代。

首先，道光以后，中国就一直挣扎在内忧外患之中，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庚子事变，外强的入侵和掠夺从来没有间断过；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直到辛亥革命，内部的抗争并由此引发的内部矛盾的爆发，也从来没有消停过。李鸿章光绪元年所上《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称近代中国的历史“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文学的繁荣时期，一般不会是一个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的繁荣时期。歌舞升平，升平的歌舞往往是没有价值的。钱谦益《纯师集序》云：

夫文章者，天地之元气也。忠臣志士之文章，与日月争光，与天地俱磨灭。然其出也，往往在阳九百六，沦亡颠覆之时。宇宙偏沲之运，与人心愤盈之气，相与轧磨薄射，而忠臣志士之文章出焉。有战国之乱，则有屈原之《楚词》，有三国之乱，则有诸葛武侯之《出师表》，有南北宋、金、元之乱，则有李伯纪之奏议、文履善之《指南集》。

近代诗人亲历了亘古未有的种种磨难，他们歌有思、哭有怀。同时，如此之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爆发，他们或见或闻，甚至亲身参与其中。乱世总是充满着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乱世也不乏横空出世的英雄，他们的诗笔，既记载着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和英雄，也宣泄着他们的喜怒哀乐的

情绪。所以，近代的历史在帮助诗人获取诗歌题材的时候，融合了西方的史诗和中国的诗史。

其次，近代以后，国门是闭不了也锁不住了。洋枪洋炮既然轰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的士大夫在见识了洋枪洋炮的杀伤力的同时，也接触了西方的新异思想——这是比之洋枪洋炮更具威力的武器，也是制造洋枪洋炮的基础所在。所以，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或者说，只是保存旧制度的无可奈何的幻想。随风而入的，当然还有全新的西方文艺思想。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以下的阐述，为我们找到了十分恰当的依据：

希腊诗人荷马，古代第一文豪也。其诗篇为今日考据希腊史者独一无二之秘本，每篇率万数千言。近世诗家，如莎士比亚、弥尔敦、田尼逊等，其诗动亦数万言。伟哉！勿论文藻，即其气魄固已夺人矣。中国事事落他人后，惟杜之《北征》、韩之《南山》，宋人至称为日月争光；然其精深盘郁、雄伟博丽之气，尚未足也。中国结习，薄今爱古，无论学问、文章、事业，皆以古人为不可几及。余生平最恶闻此言。……生平论诗，最倾倒黄公度，恨未能写其全集。顷南洋某报录其旧作一章，乃煌煌二千余言，真可谓空前之奇构矣。荷、莎、弥、田诸家之作，余未能读，不敢妄下比鹭。若在震旦，吾敢谓有诗以来所未有也。

此被梁启超“欲题为《印度近史》，欲题为《佛教小史》，欲题为《地球宗教论》，欲题为《宗教政治关系说》”，并称“有诗如此，中国文学界足以豪矣”的诗篇，便是黄遵宪的《锡兰岛卧佛》。由此我们发现，梁启超的诗歌价值标准，明显受到西方的影响。其推崇西方的史诗作家，特别欣赏他们的长篇诗作，以此和中国的诗史作家杜甫等做比较，这种比较的结果，当然是希望中国的诗歌能够和西方的叙事诗拢近。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近代对诗歌叙事的逐步重视，特别是从西方文学中汲取养分，促进了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饮冰室诗话》录《锡兰岛卧佛》说“以饬诗界革命军之青年”，可知，《锡兰岛卧佛》就是他们革命的成果和典范。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说：“时代在变，文学及文学观念也在变。这时期的变，虽然未能冲决旧的罗网，未能呈现鲜明的新色彩，但却已经在走

向新的未来。”旧的罗网终究是要冲决的，当不久之后的新文学运动兴起、白话诗成为20世纪主旋律，而众多长篇叙事诗涌现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记得近代叙事诗在其过程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和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呢？

最后，中国近代叙事诗创作之所以取得不菲成绩，究其原因，与传承和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叙事特点不无关系。这种特点既包含着诗歌的风格，也涉及诗歌的体裁。近代叙事的诗歌，古体和近体、五言和七言，都是诗人的创作载体。当然，最引人关注并最有成就的是古风乐府、七言歌行和近体组诗。近代诗人学习古风乐府创作叙事诗，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姚燮的《双鸩篇》。过去学者一般认为，此诗留有学习《孔雀东南飞》的痕迹，着眼点是篇幅之长。我以为，这种学习主要表现在题材的选择上，都是讲述自由的爱情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与不自由的婚姻之间发生矛盾的悲剧故事。《双鸩篇》以五言为主，穿梭交织杂言，这自然又是学习古乐府的另一经典名篇《木兰辞》。而以唐代新乐府的形式来反映社会的各种矛盾，也是近代叙事诗写作的一大亮点。姚燮、鲁一同、金和等早期作家和后期的金天羽等一大批诗人，都有名作传世。七言歌行的叙事源头，则是白居易和元稹。特别是《长恨歌》、《琵琶行》和《连昌宫词》三足鼎立，千百年来脍炙人口，被誉为“长庆体”。近代诗人学习《长恨歌》，主要演绎光绪帝与珍妃的故事，评价高者为金兆蕃《宫井篇》，郭则沄《十朝诗乘》谓其“追述宫史，兼及朝事……为妃惜，不仅为妃惜也”。仲联师《梦苕庵诗话》赞其“工丽无匹”，并言自己也曾以此为题材“少作《金井曲》长古一首，效香山之《长恨》，写哀蝉之凄吟，自以未工，刊集时已删去”。效仿《琵琶行》，近代诗人则以傅彩云的传奇故事加以传唱，如樊增祥的前后《彩云曲》、薛绍徽的《老妓行》等。而杨圻《檀青引》，借优伶蒋檀青的身世，感叹沧桑兴废。借鉴《连昌宫词》，尤以王闿运《圆明园词》和王国维《颐和园词》著名，其实，当时创作《颐和园词》同名诗作者，尚有张怀奇、饶智元、张鹏一、吴之英等，可见一时风气之盛。大型的近体组诗，起源于宋代。汪元量《湖州歌》九十八首、《越州歌》二十首，当时就有极高评价。李珣跋汪氏《湖山类稿》，说汪氏“纪其亡国之戚，去国之苦，间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又称“开元、天宝之事，纪于草堂，后人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而仲联师《三百年来江苏的古典诗歌》，以为鸦片战争时期苏州

诗人贝青乔，追随扬威将军奕经至浙东前线，据军中所见所闻，作《咄咄吟》七绝一百二十首，“竭尽辛辣讽刺的能事，每首都有详细的自注。这种写法，在古典诗歌领域里，是宋末汪元量《湖州歌》、《越州歌》以后所仅见的”。《咄咄吟》记咄咄怪事也。近代之近体组诗，几乎家喻户晓者，为龚自珍弃官离京南下途中所作《己亥杂诗》三百一十五首。诗歌全景式地反映了鸦片战争爆发前夜中国社会种种腐朽、混乱、没落的场面。按传统诗歌标准，近代堪称诗史者应是不少，但绝对不能遗漏龚氏《己亥杂诗》。到了近代后期，痛定思痛，诗人不再停留在揭露和埋怨的层面，而是提出了或维新，或革命的治国方略。因此，黄遵宪《日本杂事诗》一百五十四首也很有特点，很有价值。王韬作序，说其“叙述风土，纪载方言，借综事迹，慨感古今。或一诗但纪一事，或数事合为一诗。皆足以资考证。大抵意主纪事，不在修词”。作者《自序》，称出使东瀛日，“拟草《日本国志》一书，网罗旧闻，参考新政，辄取其杂事，衍为小注，弗之以诗”。谈到写作宗旨，则谓“中国士夫，见闻狭隘，于外事向不措意”，又谓日本“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而自己“久而游美洲，见欧人，其政治学术，竟日本无大异。今年日本已开议院矣，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感情上的排外，是不能成为战胜列强的法宝的。黄遵宪的叙事之诗，已不满足于记载历史成为诗史，而是要成为学习外国、维新变法的生动教材。

有感于近百年来近代叙事诗研究的相对薄弱，借题发挥，作了以上议论，就篇幅论，已经大大超过我以往为朋友和学生著作所写序言，似乎也不合序跋之类文体的规制。其实，仔细阅读亚峰的《近代叙事诗研究》，又觉得有些话成为狗尾续貂的多余了。

亚峰此书凡四章，分论近代叙事诗的主要内容、诗体分类及表现特征、表现技法以及近代诗人的诗歌叙事意识，可以说牵涉到了近代叙事诗研究的方方面面。《文心雕龙·知音》称“圆照之象，务先博观”，亚峰于此也是下了功夫的。本书最早是亚峰随我攻读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在苏州大学的三年中，亚峰的勤奋、刻苦和耐劳，是老师和同学有目共睹的。所以，一改再改的论文，及答辩之时，也得到了杨海明、谭帆、王英志、张寅鹏、马亚中等先生的一致好评。作为最早讨论近代叙事诗的专著，亚峰没有急于求成，没有赶忙出版。而是认真修改，仔细打磨。“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古人云“十年磨一剑”，亚峰考取

博士研究生至今，已经整整十年了。也就是说，此书从最初的准备开始，也有十个春秋了。在精雕细琢之下，亚峰现在呈献给学界和读者的这部心血之作，首先值得称道的，是在貌似朴拙的框架之下，蕴藏着既精巧而又完整的论证体系。具体说来，即以“叙事”为纲，不仅涵盖了近代诗歌的各个风格流派，而且对近代诗歌在艺术上的成就也作了索引钩玄的抉发，尤其是注意到了近代叙事诗与小说、戏曲之间的内在关联，实际上已经把握住了文学古今嬗变历史时期古典诗歌演进的关键所在。沿着叙事而融合俗文学的艺术精神与表现技法的方向，旧体诗向现代白话诗过渡的路径，清晰可见。也就是说，亚峰此书，不但对近代叙事诗有穷搜苞苴之功，弥补了近代诗歌研究的一块空白，更重要的是，亚峰在谨慎而扎实地试图从宏观层面对近代诗歌的发展作出规律性的总结，至少，是提供了一个新颖、独到的解读近代诗歌史的视角。当然，除此而外，本书还有很多其他的亮点，相信读者诸君，自能灼见精妙，毋须我再为晓舌了。作为当年亚峰的博士生导师，我为他这部书的出版以及他十年来在学术上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并期待他以此为新的起点，百尺竿头，放步而行。

是为序。

马卫中

乙未七月朔日于姑苏古胥门畔风云一片楼

目 录

绪论	(1)
一 选题缘起	(1)
二 概念由来	(14)
三 论题限定	(37)
第一章 近代叙事诗的主要内容	(51)
第一节 历史时事的诗史	(52)
第二节 社会民生的画卷	(64)
第三节 人物命运的传奇	(71)
第四节 经历见闻的实录	(81)
第五节 其他内容的叙事诗	(86)
第二章 近代叙事诗的诗体分类及表现特征	(90)
第一节 近代叙事诗的诗体分类及渊源	(91)
第二节 乐府叙事诗的表现特征及创作	(101)
第三节 五言叙事诗的表现特征及创作	(113)
第四节 七言叙事诗的表现特征及创作	(125)
第五节 叙事组诗的表现特征及创作	(136)
第三章 近代叙事诗的表现技法	(146)
第一节 “以文为诗”的技法	(146)
第二节 白描刻画的手法	(165)
第三节 借鉴小说、戏曲手法	(174)
第四节 意象和用典叙事	(183)

2 近代叙事诗研究

第五节 寓言和神话叙事	(192)
-------------------	-------

第四章 近代诗人的诗歌叙事意识	(198)
-----------------------	-------

第一节 中国诗歌叙事意识探析	(199)
----------------------	-------

第二节 汉魏六朝诗派的诗歌叙事意识	(214)
-------------------------	-------

第三节 学宋诗派的诗歌叙事意识	(229)
-----------------------	-------

第四节 诗界革命派的诗歌叙事意识	(242)
------------------------	-------

第五节 学唐诗派及其他诗人的诗歌叙事意识	(246)
----------------------------	-------

结语	(259)
----------	-------

参考文献	(261)
------------	-------

绪 论

一 选题缘起

本书的选题既源于对研究对象价值的体认，又出于对研究方法路径的思索。今天的研究者是幸运的，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为我们的研究带来了空前的便利，古今中西的资料和信息可以信手拈来；今天的研究者又是不幸的，我们的思维和认识也因此常常被纷繁的材料所淹没，古今中西的矛盾和问题似乎也都集中到我们这里。当然，对古今中西的所有问题笔者自然是无力回答的，但有关学术研究中古今中西的矛盾，又是每个古代文学研究者都无法回避也应该思索的，这实际上是一个百年大话题。从20世纪初王国维先生倡导的“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①的崇高境界，到当今学人关于“失语症”的觉悟和“现代转换”的呼吁，似乎我们的学术研究不仅在规模、气魄方面有所缩小，境界也有所倒退了，个中滋味恐怕只有回到具体的历史境遇中才能真正有所体悟。

与王国维先生之提倡相发明，钱锺书先生也有“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②之说。两位先生所倡之所以至今仍让我们神往不已，不仅在于其中所蕴含的融汇古今中西的学术规模和气魄，还在于溢于言表的学术终极精神和境界的展示与追求。“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自然只有“学”自身，才能消除“东海西海”、“南学北学”之差异而达于代表人类终极价值的“心理”或“道术”，这是“求是”之学的价值指向和最高境界。这种境界我们可以向往，可以追求，

①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刘刚强编：《王国维美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9页。

② 钱锺书：《谈艺录·序》，中华书局1984年版。

但要真正、彻底地实现也不太可能。因为对立和统一是相伴而相生的，彻底的统一是不存在的。如果“学”真正地、完全地达于“道”，“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学术之路恐怕也只能是寻寻觅觅、曲曲折折的。因而，笔者认为，清人章学诚关于学术的“持世救偏”之说，似乎更实际地描绘出学术发展的历程。章太炎先生也有类似的观点：“虽然，学术本以救偏，而迹之所寄，偏亦由生”^①。实际上，王国维先生学术境界的体悟和提倡也是导源于现实生活，有所实指的。近代以来，清朝政府走向衰败，各种社会矛盾弊端丛生，加之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特别是随之而来的西学东渐的文化方面的影响，刺激、震撼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他们开始思索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反思、更新乃至转换中国的传统文化。于是晚清学界出现了今古文之争、中西学之争、致用和求是之争，学派林立，众说纷纭。本来学术争鸣对文化发展来说应该是件好事，但是弊端也因此而生。争论各方往往各持己见，故步自封，甚至出现党同伐异，为政治服务的倾向。这又阻碍了学术的进一步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国维先生秉持“无偏无党”的态度提出学之“三无”之说，体现了一代学人关于学术独立的追求和建立现代新学术的愿望，自有其价值和合理性。

但王国维先生的提倡并没能阻止中国学术发展之偏颇。中国知识分子在落后挨打、专制腐败的现实刺激下，发愤图强，为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他们越来越信奉和追寻西方的民主和科学。1917年，中国知识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确立了20世纪“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拿来主义”文化策略，自此中国学术走向了“西化”的道路。传统文化也开始一蹶不振，其间虽有国粹派和稍后新儒家等提倡国学，但终归势单力薄，而且也必须打着“中西会通”、“中西互为体用”的旗帜。五四期间，“西化”的代表人物胡适“整理国故”的行为，就引起同仁的不满。他只得强调自己钻进“烂纸堆”，是为了“捉妖”“打鬼”^②。当时风气可见一斑。这种学风和研究倾向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学界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转型，其成绩和贡献自然不会泯灭。不过，到了20世纪末，一些研究中国文论的学者突然觉悟，我们失语了。

① 章太炎：《致国粹学报社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98页。

② 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现代评论》1927年3月第5卷第119期。

“我们不是用别人的文学理论来丰富自己的文学理论，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是被迫用别人的话语来言说自己的生活，理论家言洋人之所言，想洋人之所想，中国大地成了各种外国理论武器大比武的场地，中国人自己的声音却消失了。……一旦我们离开别人的基本理论范畴，我们就无法思考，无法言说了。”^① 这就是所谓的“失语症”，曹顺庆先生的观点是否客观姑且不论，实际上也有许多学者对此持不同观点。但其观点一出，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国内引起广泛的讨论。90年代后期，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成为一个最富有学者参与而又影响广泛的学术话题。学术界召开了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专门研讨会，《文学评论》组织了持续两年之久的专栏讨论，这一话题的影响可见一斑。至今，它仍是一个备受学界关注的问题。

20世纪末的学人为什么热衷于探讨这一话题呢，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只要我们翻翻当时的论文就会发现，这一话题虽以讨论中国文论的建构为中心，但话题范围却绝不仅限于此，它指向了整个中国学术文化，甚至更多。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提出“失语症”的曹顺庆先生在《东方丛刊》1995年第3辑上的论文题目就是《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他认为“失语症”的成因就在于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文化选择，在于我们为了图强求新而实行的“拿来主义”的世纪策略。其起因是因为觉得自己传统的东西不能支持民族的自强，而其结果则是自强梦里的自我其实已经不全是本来的自我。^② 既然把问题指向了“世纪性”的“拿来主义”，那就不仅仅是文学理论的问题，它关涉到整个学术文化，乃至包含了关于指导民族自强的精神信仰和思想理念方面的内容。不仅是曹先生如此，参与那次讨论的学者几乎都具有这种倾向，例子太多，不一一枚举。可见，“失语症”话题的意义是不局限于中国文论建构的，如果放入学术发展进程中去审视这一话题，它也有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是说，20世纪末学者们的那次讨论，不仅仅是关注中国文论建构本身，深层次中是在思索中国学术自身的前途和命运。他们意识到中国学术发展的偏弊，力图为21世纪中国学术的研究和发展指出一条康

① 曹顺庆、李思屈：《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文艺研究》1995年第3辑。

② 参阅曹顺庆的《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等文。

庄大道。

之所以拈出这个百年大话题，是因为希望通过学术发展史的回顾，为笔者自身的研究实践寻找方向感和思路。解决研究实践中的疑团和消除对研究本身的困惑，回顾历史、吸取经验无疑是一种好的方式。方向似乎不难把握，百年来中国学术发展的主要弊端在于过于“西化”，这也是“失语症”备受关注的主要原因。但具体如何操作以推动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这个问题就复杂了。

其实，笔者并不同意“失语症”的提法，因为它本身有点问题。但笔者认为，它的提出是很有意义的。就中国学术的发展而言，其意义在于提醒人们重新审视学术研究中的古今中西问题。自近代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学人的学术研究除历代必须面对的古、今矛盾之外，又增添了新的中、西矛盾，任何研究者都必须在古今中西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和张力。特别是新出现的中、西矛盾，从晚清至今，一直是中国学人的一块心病。“失语症”提醒我们，中国学术的发展在中、西矛盾处理方面出问题了，我们太西化了，失去了“中国的声音”^①。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我们先看看那次讨论所形成的共识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大家的共识是，我国古代文论必将成为新的文论建设的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因此应该充分继承古代文化优秀传统文化，不应再重蹈过去覆辙。”^②这样的共识实在有点让人失望。不过，仔细研读还是能看出点问题的。首先，旗帜是鲜明的，“不应再重蹈过去覆辙”，也就是我们不能再这样“西化”下去了。其次，对待传统也有个基本的态度，即传统是“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第一点应该没什么问题，至于第二点，恐怕就有点疑问了。仅仅是“组成部分”吗，为什么不能是全部呢，仅仅只能成为“资源”吗，为什么不是“理论本身”呢？我们不是要“中化”吗？

有关这一问题，蔡钟翔先生指出：“难点就在于，近百年来中国文化（不仅是文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出现了断裂，今天要把这条断裂的线索再连接起来是有很大的难度的，而这种现象在西方文化发展中却没有发生。因此，我们不可能重走王国维那样不离传统、吸收西学、创造新学语的道路，如今谁要用道啊、气啊、意啊、象啊这一套范畴来构建当代文艺

① 黄维梁：《龙学未来的两个方向》，《比较文学报》1995年第11期。

② 钱中文：《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页。

学，就会象突然穿上长袍马褂、戴上瓜皮帽一样令人无法接受。历史已演进到这个地步，是不可能倒转回去的。”^①以蔡先生的意见，我们不要说传统回不去了，就连像王国维先生那样，都不可能了。这实在有点让人难以接受，但却是事实。严格说来，任何理论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它自产生之日起，就只能成为“资源”被别人运用。完全回复是不可能的，所谓的“回复”只能是当下式的。这一点，中唐、明代的复古运动可以证明。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在于“已演进到这个地步”的时代和那个要“回复”的时代不一样了。一句话，古、今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我们的古代文学理论是与我们的古代文化血肉相连的，而古代文化又是古人生活方式的写照。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和古人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完全使用古人的话语或理论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适的。就这个意义上说，“失语”是永恒的，“失语症”的提出是没有意义的。这样看，我们所有的研究只能是当下的。传统也只能成为“资源”，成为“组成部分”，无论它多么辉煌，我们多么舍不得，毕竟时代变了。不过，“若无新变，不能代雄”^②，“变则通，通则久”。一代也自有一代之研究，我们大可释然，而不必悲观。

那么，当下所谓的中国学术的“失语症”现象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呢？笔者认为，要解决“失语症”问题，首先要弄清“失语症”的实质是什么。我之所以不同意“失语症”的提法，除了上文所谈到的严格意义上“失语症”是永恒的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一提法把中国学术国际“失声”的问题和国内“西化”的偏弊纠缠在一起，混为一谈了，不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这恐怕也是当时存在“失语”和“未失语”之争的问题所在。笔者绝不是凿空乱道，任意曲解“失语症”提出者的本意。我们只要换一思路来考虑，这一问题就很清楚了。中国文论为什么要“复语”，难道只是为了“复语”而“复语”吗？如果是这样，这一话题就只剩下民族主义的成分了，而不再是学术问题了。显然，中国学术“复语”的目的是“发声”，发出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的声音”^③。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在刺激曹先生提出“失语症”问题的中国学界的现状中得到印证。

① 蔡钟翔：《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艺学建设》，《文学评论》1997年第5期。

② 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卷52，中华书局1972年版。

③ 黄维梁：《龙学未来的两个方向》，《比较文学报》1995年第11期。